

王紅光 主編

朱良津 副主編

貴州省博物館藏珍稀古籍彙刊

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
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



王紅光 主編

朱良津 副主編

貴州省博物館藏珍稀古籍彙刊

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


· 桂林 ·

本書出版得到國家古籍整理出版專項經費資助

圖書在版編目（CIP）數據

貴州省博物館藏珍稀古籍彙刊 / 王紅光主編. — 桂林：
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，2015.7

ISBN 978-7-5495-6727-0

I. ①貴… II. ①王… III. ①古籍—彙編—貴州省
IV. ①Z422

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（2015）第 102955 號

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出版發行

（廣西桂林市中華路 22 號 郵政編碼：541001
網址：<http://www.bbtpress.com>）

出版人：何林夏

全國新華書店經銷

廣西大華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（廣西南寧市高新區科園大道 62 號 郵政編碼：530007）

開本：787 mm × 1 092 mm 1/16

印張：370.5 字數：5928 千字

2015 年 7 月第 1 版 2015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定價：6600.00 元（全 11 冊）

如發現印裝質量問題，影響閱讀，請與印刷廠聯繫調換。

Treasures for Scholars Worldwide

敘目

張新民

貴州省博物館歷來均以皮藏珍稀古籍甚夥，而爲世之耽古篤學者所稱羨。其中不少爲稿本或鈔本，實乃天壤間僅存之物，或略窺其中一二，即歎爲人生幸事，矧悉彙爲一編，而網羅殆盡，一書在手，即覽之無遺，乃至一地儒林文藝妙筆，均淋漓盡致歸之於此乎？然事有令人慶幸欣喜者，即貴州省博物館本其爲社會服務之公心，出於學界急需用書之考慮，精選慎擇極爲稀見之稿本、鈔本、孤本，凡二十二種，反復詮次編排，裒然合爲一帙，顏曰『貴州省博物館藏珍稀古籍彙刊』，並以影印方式廣其流傳，顯諸當世。凡先前詫爲難覓難窺之珍本秘笈，從此均可一睹其原貌，不可不謂爲學界之盛事，誠乃洋洋大觀之宏著矣。足證事有不期然而然者，皆在人之願力識見是否具足，願力識見大者，雖不可思議之事亦必成之；反之則拘陋齟齬，即大事垂成亦必功虧一簣。是編雖乃排纂影印之作，其功則足與著述等，則非特可見願力識見之非凡，即貢獻亦必傳諸久遠矣。

一、鄭珍著述

是編所載多爲鄉先賢之稿本或鈔本，前哲雖逝，手澤可挹，披覽遺物，如見其人。其中收錄最多者，乃遵義鄭、莫、黎三家之作。黎氏乃當地望族，先世出唐京兆尹幹，幹之後人宋初輾轉遷入四川廣安軍渠江之金山里，至明萬曆二十九年（1601）播州楊氏平，朝邦始卜居遵義治東八十里樂安江之沙灘，是爲人黔之始祖。延至清乾隆年間，則世有賢才，其中如黎安理、黎恂、黎愷、黎兆勳、黎庶昌、黎汝謙等，均以才識著述見稱於一時。而黎氏與鄭、莫二家衡宇相望，比鄰共居，非特互爲姻婭，且共爲師友，過從既多，切

磋亦密，一時彬彬稱盛，遂形成一大士人地域群體，或可稱為『沙灘學派』，其遺風流澤，沾溉於吾黔者非淺鮮。蓋其著述之夥，若以廣義之沙灘學派言，僅據民國《貴州通志·藝文志》考之，則幾佔有清一代鄉人撰作三分之一。而最具代表性者，即為鄭珍（子尹）、莫友芝（子愚）、黎庶昌（莼齋）三先生，均能昌明傳統學術，發皇鄉邦文獻，為晚清學界詩壇，添一絢麗光彩。而黔地秦漢以來，學派未開，明代王陽明龍場悟道，始有黔中王學出焉；清代鄭、莫、黎三氏崛起，樸學聲勢復震爆一時，均可見西南中原，文獻本可相接也。

鄭珍、莫友芝二人，均為清季學術之宗匠，西南罕見之大儒。二人嘗合撰《「道光」遵義府志》，燦然可入史家著述之林，享有『天下府志第一』之美譽。鄭珍曾從徽中名宿程恩澤（春海）遊，恩澤嘗受經於江都凌廷堪，廷堪勸之云：『學必天人並至，博而能精，所成乃大。』故一生學問，遂以博聞強識冠於時，舉凡六藝九流，無不深思精究，旁及天象、地輿、壬遁、太乙、脈經，詩古文辭亦頗淵深純雅。時乾嘉宿儒多已徂謝，惟大學士阮元為士林尊仰，恩澤名位雖略遜於元，然仍不失為綿延樸學風氣之一大中堅。故繼惠、戴二氏之後，世人多以阮、程二家並稱。而鄭珍之得以從其受業問學，則緣於道光三年（1823）恩澤督貴州學政。今則斯編所收，恰有鄭珍所撰《說文新附考》稿本三卷，主要區分徐鉉新附字與《說文》本字，並稽諸往古，逐一考訂，務使正字犁然別出，非僅『許君無遺漏之譏，亦令兒輩執經問字知時俗增變原委』。而尤為珍貴者，則為恩澤之批校，細字密行，朱墨甲乙，勝義紛陳，尚是當年手澤，適見獎掖後學之苦心，護養人才之微意。恩澤曾在黔省重刊岳珂五經以訓士，以後每至一地，必專意選撥人才，平生著書大多未成，傳世者惟《國策地名考》二十卷及詩文遺集十卷。嘗告誡鄭珍云：『為學不識字，何以讀三代秦漢之書？』（黎庶昌《鄭徵君墓表》）鄭珍專致力於許、鄭之學，推闡小學以通六藝，即得力於恩澤之誘導啓迪。故是稿固可據以瞭解鄭珍研治小學之情形，然亦未嘗不能一窺恩澤學問之境界，厘清乾嘉考據之學經恩澤轉鄭珍，最終化為沙灘學派之學風，而沾溉黔省學者之前後源流。則恩澤之手筆與鄭珍之親字，交相輝映，互為拱壁，不可不謂為人間難得之珍本。

鄭珍少有異才，恩澤一見即奇之，遂餉以學，而卒為碩儒。其治經宗漢，析理尊宋，均一本於師說，幼即以甥行學於莫與儔，多得其薰染，乃集兩鉅儒之長，以『實事求是』為宗旨，最精於三禮之學。自謂『小學有三：曰形，曰聲，曰義。形則三代文體之正，具在《說文》。若歷代鐘鼎款識及汗簡、古文四聲韻所收奇字，既不盡可識，亦多偽造，不合六書，不可以為常也。聲則昆山顧氏音學五書，推證古音，信而有徵，昭若發蒙，誠百世不祧之祖。義則凡字書、韻書、訓詁之書，浩如煙海，而欲通經訓，莫詳於段玉裁《說文注》，邵晉涵、郝懿行《爾雅疏》及王念孫《廣雅疏證》。貫串博衍，超越前古，是皆小學全體大用。』（《清史稿·本傳》）

則其治經，多用小學方法，然亦不廢義理，要在以許、鄭之學，折衷於程、朱之理，必求至精至當而後已。尤其禮者，乃人倫之軌範，經術之鈐鍵，故用力甚深，創獲亦多。其收入是編之撰述，除《說文新附考》稿本外，尚有六種可述，爰列之如下：

(一)《儀禮喪服漢魏六朝注說標記》，按鄭珍嘗撰《儀禮私箋》八卷，內有《士昏禮》二卷、《公食大夫禮》一卷、《喪服》四卷、《士喪禮》一卷，是稿爲擬撰其中之《喪服》篇，事前預作之稿本。凡經文上下左右，其四方之有空隙處，皆細蟻密陣，楷書工整，時見塗抹。又以朱墨兩筆旁注圈點，均以『標記』二字注明。細審內容，均漢魏六朝之文，輯自前人舊注，可證其讀書之勤也。鄭氏治禮經，多墨守司農，尤重古注，時或旁及子史，兼採石經（參閱莫友芝《答鄭子尹論〈儀禮·喪服〉大功章誤衍注文二十一字書》），雖不敢率意出入，然沿波溯源，斯分者見合，發明頗多。《儀禮私箋》原擬十七篇，惜半未脫稿，蓋經之難讀者，莫過於《儀禮》，能通其義者，戛戛乎鮮少，加之疊經兵燹，多歷喪亂，而昏、喪乃人道之至重，遂先成此四篇而已。是稿既標明爲『卷十一』，即可見其原擬成書規模，絕非『八卷』之數可限，其志必於《儀禮》全經皆有考論。冠、婚、喪、祭諸禮，歸切於人生社會至深且鉅，惜《喪服》一篇，宋元以來即有人疑其違悖經義，非子夏之作。讀是稿可知其反覆尋繹，用力甚勤，甄采亦多，取舍之間，俱有深意，非特可見前後源流，即立論亦多不可改易，誠乃康成之功臣，多能匡正舊說之舛訛也矣。

(二)《鄭珍著作殘稿》四件，分別載有《輪輿私箋殘稿》四頁、《親屬記》七頁、《警縣問答》一頁、《駁朱竹垞孔子門人考》二頁，雖斷楮殘墨，亦多緒論宏旨，吉光片羽，幸而得存，固善治史者所宜讀，不可以不完不備廢之。

(三)《鄭莫詩詞原稿》，計收鄭珍詩十九首，另附《是我非我》文一篇，收莫友芝詩八首，其中《送某太首》已有殘缺，乃鄭、莫二人合撰之原稿。鄭氏詩筆，濡染於恩澤者甚深，時人以爲橫絕一代，爲清季詩壇所無。友芝詩風與鄭珍相近，今人錢仲聯以爲其『才力騰蹕，不及子尹，而樸屬微至，洗盡腥腴，亦偏師之雄矣』（《夢笥庵詩話》）。二人均崛起於西南邊方，學問路徑既相得益彰，詩之工力亦在伯仲之間，故謂爲詩人之詩可，謂爲學者之詩亦無不可。蓋以學問入詩，又情彌天地，雖一而二，雖二而一。嚴滄浪所謂：『詩有別裁，非關書也；詩有別趣，非關理也。然非多讀書，多窮理，則不能極其至。』（《滄浪詩話·詩辨》）則多讀書而無關乎書，多窮理而無關乎理，書與理均具象爲無人之境，方爲絕佳上好之詩。而詩旨理趣，皆發乎至性至情，沁人心脾，方能移人於不覺。二人詩作均長期各自結集單行，哀爲一書者則僅見是稿，爲歷來論詩者所未見，誠乃難得之珍遺。

(四)《鄭珍手抄前人文集散冊》五種，即《漢魏六朝文鈔》十二頁、《元袁伯長清客集》(上下冊)三十二頁、《程侍郎遺集鈔》二十三頁、《清代名家文鈔》(上下冊)二十八頁、《錢儀吉文鈔》十八頁，均為鄭珍親手過錄，亦可見其讀書之勤，涉獵之廣。其中《程侍郎遺集》即恩澤所撰，蓋其曾官戶部侍郎，卒後文集乃得刊刻，後人遂以官名尊稱之。今傳《程侍郎遺集》凡十卷，乃門人何紹基依據殘稿彙輯，並囑張穆為之校訂，有道光二十五年(1845)刻本。鄭氏抄本雖未為完足，亦見師生情誼彌久彌篤，足以為授受濡染之深，再添一可靠憑證，而兼與張氏校本比勘互核，還原恩澤舊本固有之真貌。

(五)《巢經巢藏書目》一卷，鄭珍撰稿，子知同手鈔。子尹自謂『幼喜泛窺，見人家稍異者，必盡首末，稍長，讀《四庫總目》，念雖不得其本，猶必盡見之。裹足牂犍叢山之中，家貧不給饘粥，名聞不到縣尉，相過從不出閭里書師，齊秦吳越晉楚之都，又無葭莩之因可據蓄念也。凍餒追逐，有所去，即家人待以食，歸而顧擔負，色喜也，解包，皆所購陳爛，相視爽然。而余常衣不完，食不飽，對妻孥，喙稿寒栗相，亦每默然自悔，然性終不可易，迄今二十餘年矣。計得書萬餘卷，漢魏後金石文字，暨宋元來名人真跡又近千卷。雖不能名藏家，籲，亦多矣！其得之難為何如哉？』(《巢經巢記》)俗諦桎梏固苦，讀書則自有樂地。鄭珍汲汲訪書二十餘年，其中必然多有善本，雖為私家藏書目錄，當有裨於治版本學者取資。知同善紹父學，讀是本亦不難知之。是編收有其《楚辭考辯》八卷又首一卷，一一勾稽諸家舊說，詳考屈原、宋玉、景差諸家之文，涉及作者、來源、地名諸多問題，均作者自書並加以朱筆圈點者，而眉批旁注，上下塗抹，乙改之處甚多，卷首冠有黎庶昌手書題識，必是作者原稿無疑。故一併附述於此，不再另贅。

(六)《臆氏為鍾圖說》，光緒七年(1881)初刻本。黎庶昌序《巢經巢遺文》，稱其著述精者尚有『《考工臆氏圖說》一卷、《巢經巢文鈔》五卷、《詩集》□卷無傳本，資州刺史貴築高君培穀惜焉，復任剗，而先生之書始克告全』，則是書與《巢經巢文鈔》及《詩集》，最早刊刻者均為高培穀氏資州官廨刻本，惟時間早晚略有區別而已。故較諸後來輾轉翻印者，實有重要校勘價值。鄭氏治三禮，既撰《輪輿私箋》，考證《考工記》車制，又發奮成就斯書，涉及《考工記》鐘制。其書凡鐘之形狀大小、厚薄，其與音響高低、清濁之關係，均勾稽衆說，補苴舊疏，發明頗多。若與《儀禮私箋》、《輪輿私箋》合觀，則可見其經學成就。是書既出，貴陽陳矩復撰《補義》，有光緒二十九年(1903)刻本，當一併參閱。

兩漢以降，『傳孔子之道者有四學，四學者，今文學，古文學，鄭氏學，朱子學也』(葉德輝《六藝論疏證序》)。蓋今、古文師孔子，鄭、朱兩氏亦師孔子，論淵源則本為一家，考流別則同多於異。鄭珍既邃於司農之學，遵其家法，守其矩矱，立論堅實，復旁通

晦翁之說，不爭門戶，不用巧思，不廢義理，要在倡明孔子之道，使之再興於邊裔，宜乎一代經學大師，非偶然湊泊所能達致。

二、莫友芝著述

莫友芝與鄭珍齊名，時人多目爲二傑，先世江南上元（今屬江蘇南京市），明弘治中遠祖入黔，高祖雲衢遷獨山，父與儔爲遵義府教授，遂舉家移居沙灘。與儔『少時所治，惟取士《五經》，及成進士，座主則相國朱公珪、劉公權之、阮公元；又師事相國紀公昀、編修洪公亮吉，而同年友如編修張公惠言、主事郝公懿行、尚書姚公文田、王公引之，講六書、明漢學者數十計，故熟於國朝大師家法淵源』（莫友芝《貴州遵義府教授顯考莫公行狀》）。至遵義則廣購漢宋經說及清代專門名家之書，以樸學昌明弟子，一時學舍如蜂房，猶不足，僦居半城市，均相互切劘江、閻、惠、陳、段、王父子之學，而以鄭珍、友芝最爲時人所推轂。則樸學之興起於黔省，與儔實與有力焉。鄭、莫『兩先生學術思想，既大多相同，而篤於骨肉師友姻戚之情亦同，屢試不售乃得卓然千古亦同，惟邵亭先生晚至大江南北爲稍異耳』（潘詠笙《黔詩彙評》）。與鄭珍相似，友芝亦好學若性，博及群書，服膺許、鄭，兼采漢、宋，於《蒼》、《雅》故訓，《六經》名物制度，靡不探討，尤邃於版本目錄之學，較諸鄭珍專精經學、小學，雖淵源略同，趨向甚近，仍各有偏勝之場，不可繩以一律。有清一代，漢宋分門，相互詬病，黔中學者生長邊隅窮鄉，學有宗主而不立門戶，多能主動折衷調和，氣象宏闊浩大，遂不乏卓犖絕俗之士，乃能成就名山不朽事業。足證人才挺生，非地域所能限制，乾嘉樸學輾轉南浸，遂蔚然興起於西南耶。

友芝嘗先後與胡林翼、曾國藩交，並與張文虎、李善蘭、唐仁壽、劉毓崧、戴望、劉恭冕、張裕釗同在國藩幕下校讎經史，受國藩之托搜訪江南《四庫全書》殘本，一生足跡半天下，所見善本既多，藏棄幾與東南名家等；著述亦夥，功力足與乾嘉宿儒埒。其收入斯編，可述者亦有以下五種：

（一）《影山詞》二卷又《外集》一卷，收詞百餘闕，今傳本有民國年間《黔南叢書》第四集本、貴陽文通書局據莫氏家藏稿本校印本（《黔南叢書》本之單行本）、莫繩孫鈔本（藏臺灣『國家圖書館』）、民國年間向義鈔本（藏貴州省博物館），無論刊印傳鈔，均在友芝身後，故未見《清史稿·藝文志》載入。而收入是編之稿本，正乃友芝當年手跡，爲文通書局據以刊印者；比對

卷帙篇目，均與今傳本相合，具見尚是完足之本。黔中游心藝苑者，歷來詩家多而詞人少，檢讀民國《貴州通志·藝文志》，所得詞家之作，僅有三十六種，較著者如唐樹義、石贊清、陳鍾祥、黎兆勳、黎庶燾、黎庶蕃、趙懿、張鴻績、宦懋庸、莫庭芝、周婉如、章永康、劉藻、傅衡、楊調元、鄧維祺，不過數家而已。而大半均集中於遵義，可歸屬沙灘學派，誠趣事也。鄭、莫二氏均為重要詞人，然名俱為其他學術成就所掩。讀是書則可知其詞亦出色當行，不可不謂為詩詞兼工。友芝嘗序黎兆勳（伯庸）《葑煙亭詞》云：『伯庸秋試屢躓，余亦春官數困，牽連人事，幽憂無聊，乃復相與之下五季兩宋，逮本朝鉅公之製，准玉田緒論以相切劘。』考是書卷二載有《更漏子·影山草堂夜話，題贈趙芝園》一首，則成書時間必當在中歲屢試禮部不得志之後，最後編定不得早於道光三十年（1850）影山草堂建成之時。而輾轉取鑒雖多，最得力者仍為張炎（玉田）《詞源》一書。今稿本字跡斑斑俱在，若取與其他鈔本或刊本互校，則非僅有裨於其詞之探賾，亦必能增廣校讎學之發明。友芝工真行篆隸，求書者往往肩相摩門，今即得片紙亦視為珍寶，矧親睹此成冊之真跡乎？誠善本之尤佳者也。

（一）《邵亭詩鈔》稿本，不分卷，考咸豐二年（1852）遵義湘川講舍原刻本、獨山莫氏《邵亭叢書》本、民國七年（1918）貴陽文通書局鉛印本，均分為六卷，《清史稿·藝文志》亦以『六卷』入錄，或剗時乃重新分卷厘訂乎？詩之起訖為道光二十四年（1844）至咸豐元年（1851），時友芝主要活動仍在遵義，故均為其盛年居鄉之作。鄭珍曾為其刪次詩集，並撰序稱：『其制境之耿狷，求志之專精，用心之謹細，非似古人之力學者歟！其形於聲，發於言而為詩，即不學東野、后山，欲不似之不得也。雖然，孟於韓，陳於蘇，猶賴之去繯，僅一染耳。子偲方強壯，學日宏日邃靡底極，余惡知今之東野、后山者，不旋化為退之、子瞻者耶？』（鄭珍《邵亭詩鈔》序）則較諸晚歲詩作之精光燦煥，風冷雲上，早期成就雖已令人嘖嘖稱羨，仍未從前賢軌轍完全化出。然鄭與莫既為骨肉世交，則不免責善過嚴，希冀太高，今觀其題識，則知其三復含玩，多有讚語，如謂『乙巳（道光二十五年，1845）、丙午（道光二十六年，1846）兩年之作，縫深造幽，已到少陵整致境界，五字十八佳作，七字多不渾脫處，良由少決蕩耳』（鄭珍《邵亭詩鈔》丁未冬題識）。又云：『邵亭氣方遒勁，精力亦足副之，後日神明之境，定有未見水而急操妙處。』（鄭珍《邵亭詩鈔》壬子生日題識）合二人一生成就觀之，則『鄭子尹為弁冕，莫子偲足羽翼之』（陳衍《石遺室詩話》），其於詩歌創作，雖不免人工勤力，然最終仍歸於天然現成，不可不謂為出色當行。『清詩三百年，王氣在夜郎』之評騭（錢仲聯《近代詩四十家》），庶幾乎近其實矣。是稿之存留，誠幸事也。考友芝《邵亭文補》卷三，另有《邵亭詩鈔校樣》文一篇云：『此冊咸豐甲寅（四年，1854）

秋附梓人補版者，仲月補畢，與此板尚在梓人所。季月，桐賊伏城東民舍以攻郡城，梓人已舉室逃難，官兵縱火及其鄰，亟募人出城，並此冊獲至家，而梓人舍焚矣。因重裝爲補改之本，附錄朋舊詩文當酌存者數紙。』則稿本與補改本是一是二，尚有待進一步考正，然劫後猶存，亦罕見難得也。倘取是稿與今本對校，必當多有發明乎？

(三)《楊龍友先生山水移集跋》稿本。龍友名文驄，號山子，貴陽人，舉明萬曆四十六年(1618)鄉試，崇禎時官江寧知縣，福王即位南京，起爲兵部主事，歷員外郎、郎中，遷兵備副使，唐王立於福州，復拜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，屢歷戰事，奮勵振呼，欲挽明祚於既傾，終無力回天，爲清兵追騎所獲，不降受屈遭戮，一門死者男女共三十餘人。山河有淚，草木生悲，其事雖不成，志則長存於天壤間。龍友少負奇偉，善書畫，有文藻，好交遊。畫名與董其昌、王時敏、王鑒並列，乃『畫中九友』之一。鄉人楊恩元稱：『伸紙潑墨，如風馳雨驟，生趣橫生』(《明代鄉賢述略·楊文驄》)，作品近已彙爲《楊文驄書畫集》。詩歌則與陳繼儒、王思任、譚元春齊名，卓然入於『崇禎八大家』之中，友人陳子龍以爲『有幽峭之思，沉鬱之色，壯烈而不失平和，夷曠而中存莊雅，泐泐乎廟堂之音，泐泐乎山水之調』(《洵美堂詩集》序)，有《洵美堂詩集》九卷傳世。《山水移》乃崇禎二年(1629)三十五歲，隨父師孔居浙江時，遊歷天台、雁蕩諸名勝，歸來時排比整理，又附以前後一二年之作，遂哀然合爲一帙之詩文圖冊。越其傑謂讀是書，即甚感詫異，乃至『眉宇間猶有空翠紛落，頓令觀者亦爲潛移』(越其傑《山水移》序)。馬士英則以爲『天地靈秀之氣納於胸臆，映於筆舌，不離故居，頓殊舊觀，奇者移而幻，巧者移而淡，俊者移而深，麗者移而幽，奔而峭者移而靜且遠。居士讀而歎曰：龍友真移矣，真爲山水移矣，真爲赤城、龍湫之山移矣。移者不知也，受移者亦不知也。然伯牙如雪山老衲，萬緣皆墮，忽露法身；龍友則如清都道士，飛入蓬壺，形神頓異。機用相引，一似禪，一似仙，又孰知其所以移者乎？』(馬士英《山水移》序)蓋情至文生，師法造化，遂擲地有金石聲，而令人傾倒也。具見書名『移』之一字，大有深意存焉。原書凡四卷，初刻於崇禎三年(1630)，光緒年間重梓，歷來收藏者多，題跋者亦不少，早在初稿剞劂之時，撰序題跋者，即有董其昌、鄒嘉生、陳繼儒等十一人，合以送遊贈言之夏允彝、陳煒等二十六人，總數達三十七人之多，均一時名流。然明社既屋，政局詭譎，又不幸爲馬士英戚，難免不啓爭議之端，故不獨其名漸趨隱晦，即書亦多有散佚。清同治年間，友芝撰《黔詩紀略》，始廣搜資料，發奮表彰，然《洵美集》仍未能經眼，惟『《山水移》舊帙，僅存於歷劫之餘』(莫友芝《龍友楊公有後記》)，遂取集中十之八，再輔以《明詩綜》所收及其他零星散見者，共得三三五首各體詩，厘訂爲三卷，編入《紀略》。《山水移》之意外覓得，友芝嘗有言云：『歲壬子(咸豐二年，

1852)之都勻省墓，道貴陽，伯庸挾《山水移集》偕詣子方方伯，飲待歸草堂，遂有紀錄黔詩之議。』（《黔詩紀略》卷二十一《楊侍郎文驄下》）又云：『甲寅（咸豐四年，1854）春夏間，於遵義湘川講舍編完此《略》明代，當龍友兩卷成，而子方方伯殉難報至。入秋以兩卷（附）「付」雕，而楊逢喜之亂作，閣置者十五年。戊午（咸豐八年，1858）開歲，舍弟庭芝寄此稿來江南，攜之揚州整理，乃取壬戌（同治元年，1862）客皖所收石首夏雲鼎四雲選《崇禎八大家詩》，校龍友兩卷以遣伏暑，而方伯子炯寄資促刻之書至此《略》廢興，何以造於龍友，可異也。今仍舊編二卷，而以四雲所錄二百十篇，除複重三十六，編為第三卷。三卷諸篇既不在《山水移》中，知並出於《洵美堂集》，何以與朱彝尊《詩綜》錄者無一篇同？邢昉《石臼集》與龍友唱酬最夥，亦無一篇及之，豈所據猶非《洵美》之全耶？然此略之始，於君采、龍友，皆僅據小集為編，今乃各得選本增益，殆有默相然者。雖未見全集，亦差無負於兩先生云。』（貴州省博物館藏莫友芝《題黔詩紀略楊文驄卷下》手稿）文中所云『此《略》』，即指其正在編纂之《黔詩紀略》。可見莫氏之獲見《山水移》，即黎兆勳（伯庸）挾來相示者，二人因此乃商之唐樹義（子方），遂有編纂《紀略》之舉。而黎兆勳所挾來之本，據《楊龍友先生山水移集跋》稿本，則為咸豐二年（1852）其假自定番張氏者，必是崇禎三年（1630）初刻本，而得以錄副備傳者。今考《紀略》甄采龍友之詩凡三卷，前一卷即本於《山水移》，當出自此錄副之本，後一卷則采自《崇禎八大家詩》。雖難免有未睹全集之憾，然數量已頗為可觀。遍讀友芝撰作，其涉及龍友者，尚有《楊侍郎別傳》、《龍友楊公有後記》、《楊龍友先生山水移集跋》諸篇，均已收入《黔詩紀略》及其文集中，則若無編纂《黔詩紀略》之役，則未必有是稿之作歟？稿中稱友龍『詩骨挺勁偉異，已有不可一世之慨，未到者渾融耳！』蓋壯歲之作，豪氣正盛，欲求沉淡淵遠，必待滄桑巨變之後。稿中又稱其『值遭明殘局，猶螳臂擋攔，妄思恢復，膏斧鉞而不回，其志節挺挺至今有生氣。詩文流傳，正因人重，《洵美集》既不可見，而此《山水移》舊冊，又歷千百劫，僅存於塵堆鼠窟中，而乃今出之，若有陰為呵護然者，亦足珍惜矣。』均可見其表彰鄉賢遺民，重在人品氣節，雖清季高壓氣候猶在，仍曲折奮筆直書。則是稿乃其精神所寄，值得反復摩挲玩味矣。

（四）《唐寫本說文解字木部箋異》一卷，乃同治三年（1864）刻本。據是書《引》及《識後》，同治元年（1862），友芝時在安徽安慶，其弟祥芝來自祁門，言黟縣宰張廉臣有唐人寫《說文解字》木部之半，篆體似《美原神泉詩碑》，楷書似唐寫佛經小銘志，必是李唐手跡無疑，或作於唐憲宗元和年間。雖為偶存殘篇，尚不及許氏全書百分之二，仍不能不詫為千歲秘帙，佳善遠在晚出刻本之上，遂急謀集資訂勘，並與大、小徐本通讎異同，其足補正者達數十事，且多與段氏之說暗合，愈證段說精審博洽，而此

帙亦彌足珍貴。惜殘卷原件後流入日本，爲日人內藤虎氏所得，舉國奉爲國寶。惟仿刻本尚完好保存，可一窺原本之真，而知莫氏真乃有心之人也。友芝、鄭珍均從恩澤問故，精通許學，補正舊說甚多，莫氏既有是書及《韻學源流》，鄭氏亦有《說文逸字》、《說文新附考》、《汗簡箋正》，二人有功於吾國語言文字之學鉅矣。書前冠有曾國藩序一篇，書末附序則有六篇之多。其他版本可言者則有獨山莫氏《邵亭叢書》本、《黔南叢書》第六集本、商務印書館民國二十年《說文解字》本。

(五)《邵亭印存》一卷，著錄友芝篆刻三十餘方，乃民國二十二年（1933）吳載和得諸友芝之孫小農（伯恒），遂彙編爲一帙者。時去友芝謝世，已逾一甲子矣。友芝工書，真行篆隸，皆其所長，而篆隸尤有名。楊守敬總結晚清書法成就，嘗有言云：『自完白（鄧石如）後，篆書大昌，名家輩出，若楊沂孫之學《石鼓》，莫子偲友芝之學《少室》，皆取法甚高。』（楊守敬《學書邇言》）具見其沉潛於古人既深且久，遂卓然自成一大家。而其名愈高，求書者愈夥，以致肩相摩於門，雖片紙隻字，咸以爲珍寶，奉之若拱璧。而治印乃餘事，僅興之所至，偶爾爲之而已。其使刀如筆，圓整遒逸，純任自然，見者每歎爲絕倫，以爲非僅於體格間規撫秦漢者所可幾及。又其所用印章，均出自製，而子孫遞傳，原石俱在，至精美也。是書即據小農所藏，略加拓印編次成冊者。書前冠有趙薦、吳徵及題名賓者凡三序，書後復有吳載和跋語一篇，覽之知友芝篆字之外，亦善篆刻，誠乃難得一見之私家印譜，藝林必奉爲圭臬也。友芝書稿及墨蹟字畫，散見於海內外者甚多，是冊均爲自製篆隸名號刻印，據此亦可一辨孰真孰贗歟。

三、黎庶昌著述及刻書

黎庶昌少從鄭珍、莫友芝遊，熟讀經史，酷嗜古文，講求經世之學，生平作爲均超絕一時，足以震盪區宇，與鄭、莫齊名。嘗以諸生獻策，爲朝廷褒嘉，特授知縣，交曾國藩差序。國藩素重黎氏，遂接延入幕中，歷署吳江、青浦諸邑，復隨郭嵩燾出使英國，調充參贊。歷比、瑞、葡、奧諸邦，撰《西洋雜誌》一書，撮述海外見聞。以後出使日本，『提倡風雅，時開賓筵，以招文人』（孫點《嚶鳴館百疊唱集·敘目》）。日人感其『透挺溫潤，有含蓄氣象』（塩穀時敏《沈流館會後與孫君異書》），遂多有唱和，傳爲一時佳話。又搜訪中土遺獻，彙刊爲《古逸叢書》，凡二十六種，海內外學人獲覽者，無不詫爲曠世珍奇。晚年出任川東道員，設學堂，倡實業，建病院，整武恤商，建樹頗多，民建祠祀之，事蹟見《清史稿》卷四四六本傳。著述可考者尚有《拙尊園叢稿》六卷、《丁亥

入都紀程》二卷、《海行錄》一卷、《黎星使宴集合編》不分卷、《曾國藩年譜》二卷、《全黔國故頌》二十四卷、《續古文辭類纂》二十八卷、《春秋左傳杜注校勘記》一卷。收入是編者，則有兩種可述：

(一)《黎庶昌詩賦原稿》，黎氏以散文名家，詩雖不多，然偶亦唱和，則不乏可觀者，多已收入《黎星使宴集合編》及《黎星使宴集合編補遺》。其他如感事、悼亡之作，今人黃萬機先生多方輯錄，共得四十首（含《禹門山銘》），遂合為一帙，顏曰《黎庶昌詩鈔》，附於《黎星使宴集合編補遺》之後，刊行問世。是稿收詩二首，曰《哭幼孫貴清》，曰《大風洞旅雁》；載賦一篇，曰《拙尊園賦·效庚子山小園賦體》，均從未見他書有載，吉光片羽，洵足珍貴。全書或草或楷，必是作者筆跡無疑。黎氏手澤傳世不多，觀此亦必有裨於知人矣。

(二)《黎氏家集》凡十冊四十卷，光緒戊子（十四年，1888）、己丑（十五年，1889）日本使署刊本，印製精美，筆劃雋秀，雖非宋槧元刻，仍自有其風格，不失為版本學中之佳本。是集彙刊黎氏家族著述，其已刊者有：《夢餘筆談》一卷，黎安理撰；《長山公自書年譜》一卷，黎安理撰；《鈴石齋詩鈔》四卷，黎恂撰；《石頭山人遺稿》一卷，黎愷撰；《侍雪堂詩鈔》六卷，黎兆勳撰，原八卷，是本厘為六卷；《葑煙亭詞》四卷，黎兆勳撰；《慕耕草堂詩鈔》四卷，黎庶燾撰，原七卷，是本刪為四卷；《琴洲詞》二卷，黎庶燾撰；《椒園詩鈔》七卷，黎庶蕃撰；《雪鴻詞》二卷，黎庶蕃撰；《丁亥入都紀程》二卷，黎庶昌撰，活字版印。附刊者則有《青田山廬詩鈔》二卷並《詞》一卷，莫庭芝撰；《悅坳遺詩》一卷，遵義鄭珉撰；《瑟廬遺詩》一卷，章永康撰；《丈雪和尚語錄》一卷，丈雪通醉撰，活字版印。附刊雖非黎氏家族之作，然均關涉沙灘地望，或徑與其聯姻者。蓋『去沙灘里許，有寺曰禹門，為清初僧丈雪（四川內江人）所經始，負山臨水，飛樓湧殿，頗稱壯觀，寺中有讀書堂，為黎氏家塾』（《遵義新志》第十一章《歷史地理》），可見丈雪雖世外之人，亦有功於當地文化。而庶昌出使東瀛，乃於日本友人中村正直處，意外假得其全錄，遂從中輯出法語詩文數十條，均駐錫禹門或關涉遵義文化者，乃載入是集，備後人酌采。其有目而未刊，或別自梓行者，則有《詞林心醉》一卷、《運銅紀程》二卷、《野茶岡人學吟》一卷、《蔭庭雜文》一卷、《家稿彙存》一卷、《沙灘黎氏家譜》一卷、《拙尊園叢稿》五卷、《孔詒》二卷、《使東奏議》二卷、《使東文牘》二卷、《西洋雜誌》八卷、《拙尊園畫存錄》一卷、《牂牁故事》四卷、《幹生詩存》一卷、《妃蘅樓詩》一卷、《黎氏鄉會試硃卷彙存》一卷、《全黔國故頌》二十四卷、《續古文辭類纂》二十八卷，均可見黎氏一族瓜瓞綿延，非特人才彬彬興盛，即撰述亦累積繁多，不可不稱為一方望族。追本溯源，則

世代以儒家傳家，人黔未久，一世祖黎懷仁便立有家訓：『在家不可一日不以禮法率子弟，在國不可一日不以忠貞告同僚，在鄉不可一日不以正直表愚俗，在官不可一日不守清、慎、勤三字，凡百所爲，敬恕而已。』故無論在家在鄉，在國在官，黎氏子裔均能謹守儒家價值，以行事詩文見諸當世。如集中所收庶昌祖父安理（靜圃）之《夢餘筆談》，雖爲筆記小說，多托之以夢，文甚怪詭，仍頗具警世之意，規過之思。誠如莫與儔所說：『語夢不言果報，非無其事也。聖賢不必有果報，而自爲聖賢耳！亦以世患日滋，人心易溺，縱欲趨利，千狀萬態，苟無所悚惕以遏，將來誠不知胡底矣！』黎靜圃先生以經術爲循吏，出處進退規規焉惟恐抵牾於聖賢作爲。文章宏通爾雅，鄉人至今稱誦之，復以平生閱歷與夫耳目所及之足以駭觀聽、寓懲勸者，雜書之曰《夢餘筆談》。夫人心之積蔽，莊言之不入，或嬉笑而解焉；專言之不喻，或旁推而悟焉。《筆談》之作，其亦有經傳警世之意乎？或曰先生居近禹門山舊丈雪道場，猶有其遺風焉，故所言多洞佛理，了生死去來，是則非余所敢知矣！』（莫與儔《夢餘筆談》序）則其進退出處，一皆以聖賢爲標準，而用心既在諷喻懲勸，遂時或雜以釋氏因果之說。鄭珍述其一生行事，即徑以『名教完人』稱之（《播雅》卷十四《黎府君安理傳證》）。《長山公自書年譜》則自述一生際遭，時人以爲其『幼遭不造，備歷險艱，日夜奮智焦神，以勗於躬而養於家，孝於親，盼然如恐不及，若儒若農，若商若醫，（靜圃）先生以一身兼涉其涯而不常厥業，藉博旨甘滷瀧之資，雖僅免隕越，而勃豁之聲，死喪之威，疾病之憂，又叢迫焉。先生順受不驚，苦心經營，調護無形，遂紓家難而慰親心』（薛福成《書黎靜圃先生年譜後》）。另有《鋤經堂詩文集》，詩沖淡秀雅，文則樸渾明確，均可見黎氏一族，自安理以來，文人化發展趨勢始愈加突出，撰作則代代相續，亦以安理爲一大坐標。安理之後，其子二人，均多有著述，成就遠在父輩之上。如恂（雪樓）便自謂：『人以進士爲讀書之終，我以進士爲讀書之始。』故終生勤讀不輟，又多得江山之助，長於吟詠，詩作見於《鈴石齋詩鈔》者，人稱『波瀾壯闊，雅健清深』（劉榮黼《鈴石齋詩鈔》序）。而『於古、今詩尤所長，早年落筆千言，縱橫自恣，後出入唐宋，不主一家，以前貴州詩人，未能或之先也』（鄭珍《舅氏雪樓黎先生行狀》）。愷（子元）之與恂，一儻通易，周覽群書；一厚重寡言，氣落落吞餘子，兄弟自爲師友，人咸目爲雙璧（鄭珍《仲舅黎公行狀》）。《石頭山人遺稿》有愷自序云：『余非能詩也，其所以作詩者，紀事也。紀我所歷執念，所遊之地，所處之境，所行之事而已。亦非存詩也，其所以不付諸灰燼者，將以示我祖孫也。存吾詩，而使我子若孫讀之，知我非富貴福澤人，非清閒之流，亞谿刻之品行也。』則以詩紀事，意在垂教，故視爲詩固宜，視爲遺訓亦無不可。然其詩『清微稚潔，品骨俱勝，孔君魚仍不敢望子駿肩背』（《播雅》卷二十一《黎訓導愷傳證》），仍自有可傳之處。自『長山開先，雪樓涵蘊之，而世愈昌，子孫彬蔚，人各有集，稱爲西南名家』（《黔詩紀略後編》），遂形成一詩家群體，開黔北風氣。恂之子，曰兆勳，曰

兆熙，曰兆祺；愷之子，曰庶燾，曰庶蕃，曰庶昌，均各有撰述傳世，而見諸是集之中。於詩之一道，尤多有建樹。如庶昌仲兄庶蕃之《椒園詩鈔》，莫祥芝之序稱『詩不過數首，以之角逐中原，使遇劉、項，正不知鹿死誰手』，適見其詩學成就之高，已足可與中原詩家一試高下。庶昌之後，復有汝弼、汝懷、汝謙、汝貞、汝林、汝華、尹融、梓等人相繼崛起，雖成就有高下，影響有大小，然俱有詩集藏於家，而與鄭、莫兩家互通聲氣，彼此支援，遂使江山文藻，熠熠生光，流風餘韻，沾溉百年。乃至咸同兵燹，於『兵戈擾攘之中，戎馬倉皇之際，貴州之著述界，如火如荼，光焰萬丈，焜耀西南，為前此所未有，亦輦鼓中之特點也』（凌惕安《咸同貴州軍事史·輦鼓中光輝萬丈之貴州著述界》）。而論其前後源流，則以沙灘一派為冠冕。足證『沙灘不特為播東名勝，有清中葉曾為一全國知名之文化區』（《遵義新志》第十一章《歷史地理》）。

四、沙灘學人群體著述

除上述鄭、莫、黎三家之書外，收入是編之其他沙灘學人撰作，可舉者尚有鄭知同《楚辭考辯》（稿本）、黎汝懷《黔風演》（清末刻本）、黎尹聰《古泉書錄解題》（光緒二十一年遵義黎氏刻本）、莫庭芝等《黔詩紀略後編》（清宣統三年陳夔龍京師刻本），誠可謂洋洋大觀矣。

沙灘學人撰作繁多，不遑一一備述。茲僅以《黔詩紀略後編》為例，略論其編纂前後原委，必要時亦可旁及他書，獲舉偏概全之效也。按《黔詩紀略後編》一書，凡三十三卷，載有清一代黔省詩作，合計達兩千二百八十九首，可謂繼《黔詩紀略》之後，又一集大成之詩歌總集。書成後貴陽陳田復撰《紀略補》三卷，輯錄明代詩家四十五人、清代一百四十五人，得詩凡三百三十三首，而與《黔詩紀略》前後銜接，不妨視為文獻史上之雙璧。采詩者莫庭芝、黎汝謙，前者乃與儔第六子，《青田山廬詩鈔》二卷並《詞》一卷，即出自其手，已附刊於《黎氏家集》之後；後者則為兆祺第四子，曾調充日本神戶、橫濱領事，著述有《夷牢溪廬文鈔》、《夷牢溪廬詩鈔》，並譯有《華盛頓全傳》。作傳證者則為貴陽陳田，嘗任吏科給事中，才氣踔厲風發，與沙灘學者多有交往，惜長期名晦而不彰，撰有《周漁潢年譜》一卷，已收入是集，可與同收入集中之《周起渭行狀》（周嶽、周華撰）比觀互核，另有《明詩紀事》二百卷，亦研究明史有用之書。

有清一代黔詩之搜輯，其事當始自傅玉書（竹莊）父子。即所謂『自傅竹莊父子始，厥後一輯於黎伯容，再輯於莫芷升、黎受生，中間又有銅仁徐蔗塘。……他如鄭子尹之《播雅》、胡子何之《上里詩系》、趙知山之《桐故》，其采輯一郡一邑者，又不在此數。合十數人之力，閱時百年，輦路藍縷，傅氏爲勞，而黎氏、莫氏搜采之勤，聞見之博，子尹、子偲二先生亦與有力焉』（陳田《黔詩紀略後編·識語》）。足證黔省歷代詩歌文獻，乃積多數人之力始得藏事，而論其開創之功，當首推玉書、汝懷（淵伯）父子。玉書撰有《黔風舊聞錄》、《黔風鳴盛錄》各六卷，搜輯歷代黔中學者詩作，雖零篇勝句，亦多方甄錄，而詩繫以人，人繫以事，以人存詩，以詩存人，發凡起例，厥功甚偉，故『自前明迄今，數百年之人才，賴君以傳者不少』（胡枚《黔風錄》序）。汝懷所輯《黔風錄》四卷，則收錄乾隆、嘉慶兩朝詩作，凡三十餘家，可視爲《黔風舊聞錄》之續作。惟玉書之《舊聞錄》與《鳴盛錄》，雖合刊於嘉慶二十二年，然歷來罕見，今幸其鈔本尚有保存，汝懷之《黔風演》亦梓行於道光年間，今傳世者已不多，二者均一並收入是編，不可不謂爲學界之幸事也。

繼傅氏父子之後，就清詩之搜考而言，黎兆勳（伯容）、莫庭芝（芷升）、黎汝謙（受生）相繼奮起，俱有功焉。而鄭珍、莫友芝、徐棨（蔗塘）亦出力甚多，其後《黔詩紀略後編》出，『二百數十年黔人之詩，乃蔚然斐然鏗鏘鼓舞而出諸荒山古箐中』（陳田《黔詩紀略後編·識語》）。其中較可注意者，則爲陳田之傳證，凡詩派之流別，品次之高下，均一一有所詮敘，足可與《黔詩紀略》媲美，而一省之作者，遂蔚然成巨觀矣。

又收入是編，而歷來罕爲人知者，則爲《陽明先生遺像題跋》一冊。冊之封面有『王陽明先生遺像』篆書大字七，下題『獨山後學莫友芝書』，並鈐有其朱印一方。書簽『陽明先生遺像冊』七字，則爲何紹基所題。內有陽明燕服坐像一幀，奕奕如生，不類尋常，與貴陽陽明祠庋藏侯服大像之莊嚴威儀，風格迥然不同，神貌則頗爲酷肖。次爲門生王畿、鄒守益、錢德洪、侄王正思所撰像贊，字體筆劃風格如一，且同書於一紙之上，必出自一人之手，乃輯錄他書者。再一紙即『山陰張陶庵岱』所撰像贊，後附鄭珍書後識語一篇，字體雖有大小之別，然點畫同樣妙出一人之筆。初一翻閱，即知二者均爲珍之手澤，復細讀識語，則果然足可印證契合。珍之識語，詳述前後源流，甚有裨於考史，不妨具錄：『此陽明先生燕坐小像冊，曩爲先生裔孫蘭陔所藏。蘭陔自其父久客湖南，遂爲善化諸生。後攜此冊遊黔，以存臬使唐鏡海處，而食於他所。鏡海調官去，留之巡撫賀耦庚長齡。道光甲辰（二十四年，1844），耦庚遂以藏行省東郭外扶風山先生祠中，令祠祝世守。山陰王上舍個峰介臣，爲先生疏屬裔，與余言本末如此。余據袁簡齋題識所稱，無錫縣典史王裕猷者，不知爲蘭陔何人，以知冊由裕猷始傳至蘭陔父子，其前不能詳也。祠中別藏侯服大像，幅高